

乡村振兴:嵌入视角下工商资本与乡土社会的互动探究

杨雪云,穆颀昌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参与到农业生产之中,在我国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工商资本作为“外来者”嵌入到乡土社会中,原有结构中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思想观念会自然产生排斥反应,再加之许多工商资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经营环境的本土性,致使下乡资本面临着严峻的嵌入困境。若使下乡资本转变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属性,使自身内化到乡土社会中,达到扎根乡土的目的,就需要其与农村进行良性互动。这种互动是双方互为主体,主动做出改变以适应对方发展的双向互动。即工商资本在下乡过程中获得乡土性的同时,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农业生产活动也不断具有城市性,双方互相建构,不断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资本下乡;嵌入性;村企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4)01-0079-08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难题”^[1]。截至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炉,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力措施,也是推动我国农业转型,探索我国农业发展该往何处去的重要战略抉择。但由于我国农村内生力量不足、生产要素缺乏的现实情况,致使农村无法凭借自身实现生产力变革;同时,城市部分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社会资本投资不顺的突出问题也使工商资本面临着发展困境。面对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到乡土社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中便具有了现实重要性与必要性。此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用工业化理念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工商资本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注入活力是解决农村发展乏力、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现实困境,我国探索出了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发展道路,这也为社会资本的“上山下乡”提供了政策环境。

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资本下乡”的推进同样具有复杂性。首先,工商资本带有鲜明的“城市性”,其专业化管理、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的特点,与传统的家庭经营、精细化劳作的传统农业有着明显的区别,生产方式差异的背后是自然禀赋、人文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不同。因此,外来资本在介入到乡土社会中时有着作为“陌生人”的劣势,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所“嵌入”的乡土社会发生冲突。其次,部分经营主体在嵌入过程中过于依赖当地政府的介入,这对于工商资本

收稿日期:2022-12-27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1D69)

作者简介:杨雪云(1969—),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融入当地产生了阻碍。最后,大部分下乡资本所经营的农场在嵌入之后为解决内部监督难题,在经营模式上最终又转向规模相对较小的家庭经营,盈利也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的政策补贴与项目奖励资金,再加之当地村民阻碍生产等的现象频发,导致农场花费过多的精力、财力用于解决此类社会性事件。由此,从农场的生产模式以及盈利手段来看,既没有带来农村生产力的质性提高,也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综合来看,工商资本在嵌入前、嵌入中和嵌入后都会遭遇到来自乡土社会的阻力,另外,值得思考和讨论的是,资本下乡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现实必要性,但在其实践过程中并未取得显著的现代化成果,这一悖论式的现象要求我们反思资本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寻找一条双方互相建构的新途径。

二、工商资本与乡土社会运行逻辑的双重性

从资本的逻辑来看,资本下乡的兴起是市场供求关系改变与自身利益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而乡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在乡土社会,“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3]30} 这样一种差序格局构成了一个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的逐利性和流动性与乡村社会的私人化和相对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利”与“情”的对立以及基于此所产生的运行逻辑差异致使资本下乡遭遇重重困境。在笔者看来,资本下乡,并非生产要素的机械嵌入,它应在与乡村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融入”当地,即在陌生的差序格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就需要像斯科特所提倡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样,^[4] 分别从“资本的视角”(seeing like capital)“乡村的视角”(seeing like a rural)出发,以不同的互动主体作为分析中心,了解问题所在,探究解决策略。

(一)资本的视角——经济理性驱动的“外来者”

从资本下乡的动机来看,除了资本的利益导向之外,还有资本所有人的精神导向。首先,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消费观念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居民由之前低层次的吃饱穿暖转变为追求绿色、安全的生活品质,“绿色食品”“原生态”等概念应运而生,原生态农产品的市场逐渐扩大。为拓展自身盈利空间,众多工商资本开始“瞄准”生态农业这一蓝海产业,试图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占领价值洼地,拓宽利益渠道。^[5] 其次,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优惠和补贴政策,在经营环境、基础设置建设、贷款融资等方面减轻了下乡资本的压力,为资本下乡创造了良好的软硬性条件。这也使得政策补贴成为一部分农场的主要盈利项目。再次,“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村出身的工商企业家对家乡的发展最为热心。”^{[6]31}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趋向于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满足自己物质层次的需求之后,精神层次的满足便成为其新的追求目标,这也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契合。

从资本下乡后的经营模式来看,工商资本在下乡后往往都对其在城市中经营时所使用的公司化管理方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适,“诸如‘土地分级承包’‘土地转包’‘公司+代管户’‘土地包方制’‘公司+租地农’等名称揭示了同一类现象,即规模经营被各种形式的土地分包所取代。”^{[6]34} 通过这样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使已经流转的大规模土地重新分割成若干个“土方”,最终走向了规模经营的反面——家庭经营。生产组织形式转变的目的在于镶嵌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农场主以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移植”到农场中的方式来弱化经营过程中的监督困难。因此,所流转的土地在地理意义与社会意义上都成为乡土社会中的一块“飞地”,下乡资本在完成内部一体性的同时与外部乡村社会隔绝开来,“外来者”属性在此过程中亦不断强化。

(二)乡村的视角——小农道德感性维系的“自己人”

从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来看,首先,乡村社会具有低特征流动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在

费孝通先生看来正是这种低流动性造就了乡村的乡土性。^{[3]7} 人员的低流动性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稳定,致使聚村而居的村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因熟悉而信任彼此,将交易与交换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而很少依靠契约。村民之间相互帮助,在一来一往间完成“人情”的交换,以达到在交往过程中“心安”的目标。在上述种种行为中,极少有陌生人参与,这也就意味着当有外来者“闯入”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时就会引起当地人的关注和讨论。

其次,“私德”对乡村的笼罩性统治。自秦朝设郡县以来,由于中央权力难以延伸至帝国的最基层,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便形成了地方乡绅自治乡村的局面,所谓“皇权不下县”也正来源于此。正因有着这样的历史传统,“伦理”成为了乡村社会的行事准则,私人化的道德在差序的人伦中占有统治地位,由此带来的是非正式权力的普遍使用,“公法”因此在“私德”面前失去了优先性。

再次,小农经济的悠久性。我国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虽然历朝历代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再加之尖锐的人地矛盾,封建王朝对土地兼并常加以限制,因此“一家一户,男耕女织”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解放后,我国虽然进行过短时间的公社化运动,但因其生产关系大大超出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反而制约了当时我国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依然被沿袭下来,历史传统与制度设置共同造就了我国如今“大国小农”的局面。然而,“近十余年来,中国已经告别‘乡土中国’进入了‘城乡中国’,乡村社会的诸多方面发生了革命性跃迁”。^[7] 首先,农民选择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的比重迅速上升,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改变,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接触并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念,这对传统的乡村价值观产生了冲击。其次,村民人际交往的现代性特征显现。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映射到农村便是村民之间基于生产互助的私人关系的淡化,乡村社会传统人际关系中的注重血缘、强调人情、重视熟人信任关系的特点已经发生转变,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结削弱,社会关系出现陌生化、理性化、功利化倾向。

最后,乡村社会公共价值体系面临重建。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城市价值观念不断冲击,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中,庞杂且不分良莠的信息数据被输入到农村之中,在帮助农民更快、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的同时,也大大超出了农民的认知负荷,盲目接受新观念的同时也导致了乡村精神维度的普遍萎缩。除此之外,一套完全有别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基于城市环境中陌生人互动的价值准则与行动秩序也呈现在村民眼前,农村传统的公共价值体系开始动摇,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并且将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三、资本下乡的嵌入困境

笔者以一种“割裂”的方式分别从“资本的视角”与“乡村的视角”阐述了两者的基本特征与运行逻辑,但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界限分明的叙述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检视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差异,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互动不畅的症结所在。但对资本下乡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本与村庄基本特征的比较或二者表层的互动关系上,更加重要的是发现互动行为背后的文化及伦理因素。因此,从上述内容出发,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两个互动主体在资本下乡这一事件中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心态”,从村民与企业经营者交往互动背后的观念世界出发,对资本下乡所遭遇的嵌入困境作出解释。

(一)农民的“缺场”——弱势乡村与强势资本的矛盾

资本下乡的目的是通过资金与技术的投入、产业化的经营等手段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产品市场化,从而扭转乡村社会市场滞涩、力量薄弱的弱势局面。但许多地区的下乡资本在实际经营中却发生了意愿偏离,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双方的对立。总的来看,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的“缺场”,即在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民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渠道的缺失。^[8]

首先是工商资本下乡之初所蕴含的“有偏逻辑”。资本下乡可以加速地方土地流转,^{[9]47} 同时工商资

本也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治理主体介入到当地事务的治理中,从而降低政府的治理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下乡并不只是资本单方面逐利的结果,而且符合地方政府的治理意愿,其得到政府的支持也就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但正是由于政府在资本下乡中“存在感”的彰显,反而隐没了农民的声音。徐宗阳展示了乡镇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活动,但在此过程中忽略了政策的宣传、农民意见的征集。^[10]诸如此类的行为都使资本下乡偏离初衷。

其次,如果说上述现象只是无意之中在村民心中营造了一个资本的强势形象的话,那么,某些下乡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对村民与集体利益的压榨,完全将自身放到了乡村社会的对立面。这种“压榨”主要体现在企业对当地廉价劳动力、土地与原材料的侵占。^[11]某些企业无视当地的土地条件与环境代际效益,盲目种植在短期内就可收获的经济作物,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土地条件恶化,影响村民之后的正常劳作,而且会使大量土地“非农化,非粮化”,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监管“缺位”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政府更多的是扮演“引路人”角色,在下乡之初对相关企业的资质、财力以及投资目的缺乏审核,对下乡资本的经营状况没有跟进监督,致使有些“不良资本”进入乡村,对原本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损害。再加之农民的维权意识较弱,乡镇政府也缺失维权逻辑,以上种种都致使农民在农田中出现了实质的“缺场”问题。

农民流转土地并不意味着农民要脱离土地,恰恰相反,资本要用新的生产经营策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但大量的背离资本下乡初心的现象导致了资本与乡村强弱力量的差异。也正是农民对自身弱势一方形象的认同与接受,使其在农场经营过程中常常采取一些隐性抵抗行为来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这种双方力量明显不平衡的互动使资本下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二)劳动管理——农场主与雇工的矛盾

当土地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就需要雇佣劳动力来进行劳作,富有种植经验的当地农民便成为了首选,农场获得优质劳动力,当地农民成为“既拿地租、又拿工资”的“新农民”,这样似乎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正是这种雇佣本地农民的办法却造成了日常劳动管理、监督的“水土不服”。

劳动的监督管理受到农业生产特殊性的影响。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再加上某些农活时效性要求不高,只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即可。因此,即使加大监管力度也会因各种不确定性使村民有机可乘,导致监督管理面临监管地域面积广、可操作性低的双重困难。

除了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对于监督问题的考察还应回归到“人”的因素。首先是雇工日常劳作中的懈怠。在自家的地里一天能完成的工作,放到农场中去要做要拖延至两到三天,笔者就此现象曾专门与当地村民进行交谈,“不是自家的地,不用这么上心”“承包人家大业大的,我多挣他两天的工钱算啥”“他这么大一片地又看不过来,他哪知道我干多干少”。从村民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监督困难导致了做工效率低下,拖延工期以获得更多的报酬成为当地村民的普遍选择。其次是本地村民的难以替代性。“他不找咱干活还能找谁?他人生地不熟的,找本村的可不就图个方便”“我敢说他找其他村的人也一样,没有那么多眼,看不过来,再说他找本村的还能维(方言:维持)个好人”。对于监督困难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似乎通过简单地更换一批雇工就可以解决,但从与村民的交谈中可以发现雇佣当地村民不仅方便,而且还可以与乡村社会维持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另外,“外村来也一样的情况”反映了乡村社会是以整体的形象呈现在下乡资本面前,因此村民以“人生地不熟”来概括下乡资本的外来者处境。正是监督困难与外来者处境的双重作用助长了村民的“欺生”心理,而“欺生”恰好反映了乡村社会在面对“外人”时的基本反应。

“水土不服”的劳动管理处境无形中加大了资本的经营成本,从中也可以发现上文中笔者所阐明的一种强弱关系在进入乡村社会、与当地村民实际接触后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并非由“资金、技术、工具”这种生产要素所决定,而是由村民利用本地人优势而实现。因此,农场主与雇工的矛盾由更深层次的“内外矛盾”所统摄。

(三)收获的季节——“守护者”与“入侵者”的矛盾

如果说偷工减料、拖延工期是一种“温和”的抵抗方式的话,那么,在农场收获时进行的偷窃行为便使村民与农场之间的矛盾又上升了一个层级。在有关资本下乡的研究中,均有农场作物被大规模偷抢的现象,^{[6]23,[9]48}面对农场几乎每年都会遭遇到当地村民偷盗农产品这一普遍性问题,笔者也从本村种粮大户处了解到,他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诸如打骂、罚款、报警等常规惩戒措施并不能有效制止村民们的偷盗行为。面对这样一种明显违法且伴有惩戒措施的行为,当地村民屡教不改的原因以及支持村民这样行动的心理机制还应回到村民身上寻找答案。

导致村民偷盗农作物的动机各有不同,除却为了占小便宜、盲目跟风等这种单纯属于人品问题或环境影响外,最重要的是找到村民说法与行为背后的共同逻辑,正是这一共同逻辑导致了偷盗农作物作为一种整体性事件发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我拿他点东西不怕,我能拿他多大点东西”“外乡人来种地,我们拿这一点,权当个‘保护费’,他不亏”。从村民的言语中可以发觉,下乡之初政府过多介入的副作用在此时表现出来,“政府兜底”既是对下乡资本形象的认知表述,又是村民的行动动机。还应注意的是,“外乡人”的概念再次出现,可见村民对于内外之间的界限有着明确且强烈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支持村民名正言顺地“拿”农场的农作物,并将其冠以“保护费”的名义。

除此之外,笔者还曾从几名不参与偷盗活动的村民那里了解过情况。“年年有去拿的,也不能赖我们,前几年就他种的洋葱都快烂地里了,拿点也不能算他损失,我看他也干不长久”“哪个村里没几个人性不行的,之前我地里就常常有人偷,他这一来好了,反倒都去他地里偷了”。资本的经营不善与政府的过多补助使二者再次以“捆绑”的状态同时出现在村民面前,“集体的就是大家的”,这种源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观念依然影响着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村民。“他一来别人就不偷本村的了”,依然是一种“欺生”心理的表征,“欺生”背后是本地村民对本地人利益的维护与对外来者的排斥。

乡村社会独有的内在性赋予了村民行动的正当性,村民自己的道理使其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进行偷盗行为。同时“公法”对于农场主利益的维护效用被乡村的“私德”所忽略,这种“私德”作用下的内外逻辑体现了乡村社会在面对外来资本时所产生的社会心态,并指导着村民们的行动。

(四)内外有别——“交情”与“公事公办”的矛盾

“交情”即“交往与情感”,产生情感既是交往的结果也是交往的目的,那么,工商资本在整个下乡过程中是如何与乡村社会交往的?又是否达成了与村民具有某种情感联结的目的呢?首先,在下乡之初资本借助行政强制力在短时间内获得大规模的流转土地,再加之某些农场在经营过程中所采取的某些损害当地农民利益的行为,使农民对下乡资本的效用发挥做出了有偏判断,隐含着对立的意味。其次,在劳动管理环节出现的监督困难,以及在收获时节出现的大规模偷盗行为是村民利用“内外之别”对原本的强弱关系进行了逆转,“守护者”与“入侵者”易位,使工商资本所经营的农场成为乡村社会中的“飞地”,农场主的境地逐渐被动,双方在互动中产生正向情感也就无从谈起。

在矛盾发生后,资本方面是否做出努力以修补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呢?从农场在发现村民偷盗后所采取的打骂、罚款和报警等措施来看,可以发现其行事风格依然是“公事公办”的逻辑,这与村民间所注重的“交情”产生了矛盾。从与乡镇派出所人员的交谈中也可以发现农商观念的龃龉,“每年收粮的时候都得报上几次警,要我说报了也没用,这边拘个两天,回去又开始(偷)了,我觉得这个管事儿的也不懂事,你看见别人拿了,你说几句好话,我不信他还好意思接着拿,说到底还是不会维人,要我说过年过节的给村里发点米油,没事多跟村里走动走动谁还好意思跟你过不去呀”。由此可以看出,乡镇派出所作为行政力量却受到了乡村人情社会特点的影响,主张通过与乡村建立交情的方式来缓解矛盾。“人情”的力量使地方行政力量陷入尴尬,一方面要维护村民的“情面”,另一方面作为执法人员,又要维护下乡企业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在资本与村民的博弈之中面临着两难境地,村民与下乡资本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摩擦迟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得到缓解或解决。

笔者发现,资本下乡自始至终都维持着一个暧昧不清的形象——在某些环节它需要充当治理者,在某些环节它是农场。因此,派出所民警所说的“维人”“多走动”就是使资本以私人的形象出现在村落之中,与当地村民建立起私人联系。或者说建立“交情”的过程就是使资本自身内化到乡村社会的过程,只有被村民认可为“自己人”才能破除内外逻辑所形塑的村民的固有行为,改变外来者处境。

四、工商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路径分析

上文的论述展现了资本与乡村在资本下乡这一件事上“社会心态”的差异,并对资本下乡所面临的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做了简要阐述。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以“内外逻辑”来解释村民的行为,并不是要为其进行辩护,而是揭示这些行为为何在村民的观念世界具有正当性,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资本嵌入乡村的关键所在,互动不畅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

(一)从“嵌入”到“扎根”

波兰尼与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嵌入性,都强调经济活动嵌入非经济的制度或者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12,13]但大部分的资本下乡项目往往忽略了社会结构中“人”的因素,采取单向的机械式的嵌入,只做到了资金技术等硬性条件的下乡,与当地农民融合度不高,也就出现了上述的嵌入困境。针对资本下乡中嵌入性的不足,有学者提出了“有机嵌入”的概念,指在企业嵌入乡村社会的基础上与当地村民建立起双向互动、紧密连接的关系^[14]。从有机嵌入的概念出发,笔者认为资本下乡要更进一步,实现从“嵌入乡村”转向“扎根乡村”。扎根乡村不仅要求企业落户乡村,与当地村民建立起简单的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外地企业要接受乡土社会中的伦理规则,与当地村民建立起乡土社会意义上的交情,将自身的“外在性”转化为“乡土性”,这样才能具备扎根乡土的社会基础,脱嵌困境也就迎刃而解。

第一,下乡资本应使当地村民切实享受到投资效益。首先,资本与乡村互动的滞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下乡资本由于监督困难等问题很少甚至放弃雇佣当地村民,致使双方内部各遵从一套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因此,要使“外面的人进来”,积极且规模使用本地劳动力,向乡村社会释放出友好信号。其次,建立完善的雇佣机制。企业要摆脱以往在使用当地劳动力时所采用的“即用即走,日结工资”的雇佣模式,与当地村民发展出长期稳定的劳资关系。合适的薪资水平、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柔性的管理规范等都是促成企业与村民间长期合作关系的有效举措。最后,下乡资本要给当地村民带来切实的“便利”。企业对于农场所有的大型农用机械、水利灌溉系统以及开辟和铺筑的硬化道路等基础设施,应树立起互惠共享意识,使当地村民在自己的劳作中切实感受到便利。如此一来,通过薪资形式的“财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便利”,下乡资本便能削弱与乡村社会间的交流屏障,为进一步嵌入乡村社会建立较好的基础。

第二,下乡资本要与当地村民建立“交情”。在乡村社会中村民通过相互帮忙来完成“情分”在村庄内部的流通,并通过它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阎云翔将这种现象称为“礼物的流动”。^[15]因此,要与当地村民进行交往并进一步建立起情感联系,“送人情”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利”与“情”是互相服务的,上文所提到的企业为村民所创造的“财利”和“便利”,其目的就在于向乡村传递某种“情分”。其次,农场在与村民发生日常矛盾时应采取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为村民留足“情面”以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再次,资本在村中应发挥一定的福利功能。如在节假日为村内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给予一定的物资补助,不定期进入村庄内走访和看望贫困家庭等举措,都可以使下乡资本在村民中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另外,人情往来作为传统乡村中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使得村民十分重视对人情的“反馈”,在人情“送予—反馈”的过程中,资本与乡村间的“交情”就可以更加顺利地建立起来。

第三,下乡资本与乡村间“利”和“情”的流动离不开政府的连接。首先,在资本进入之初,县级或乡级政府应制定详细且严格的投资条例,明确规定土地用途、土地承包期限以及土地流转价格等。坚决制止破坏土地等公共资源、严重损害村民权益的经营行为,维护好村庄的公共权益。另外,要制定清晰的补贴

发放指标,建立严格透明的业绩考核机制,确保财政补贴的发放“名副其实”。其次,基层政府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权威代表,具有维护村民利益的义务;另一方面,面对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和地方经济发展压力,也有吸引和鼓励资本进入的需求。因此,在作为资本下乡“引路人”的同时,更应做好协调者的工作,在下乡资本与当地村民出现矛盾时及时介入,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在企业雇佣劳工这一环节中,村组织要扮演好“经纪人”的角色。即村组织应作为第三方在农场和村民之间就雇佣问题进行协调,做好联系劳动力和薪资发放工作。这样既可以保证村民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出面追究责任,也可以将劳动监督权让渡给村组织,降低农场的经营成本。

在整个嵌入过程中,资本、村民、村组织以及各级政府建立起互动关系,使下乡资本的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生产资金,乡村社会的人力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土地资源,村组织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得到整合,下乡资本在进行社会关系嵌入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源嵌入。在社会关系和资源的双层嵌入基础上,下乡资本扎根乡土的目的也就可以顺利达成。

(二)从互动到“互构”

从新农村建设到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都在强调要实现我国农村的“更新”与改变,资本下乡后作为新的乡村治理主体,也应参与到这种变化中来,推动乡村实现良性的转变。笔者认为,这种改变就体现在农村“城市性”的增加。因此,资本下乡要求资本进入到乡土社会内部并对其进行“城市性”的建构,这与资本下乡后所要进行的“乡土性”改造相对应,基于二者的良性互动,最终达到互相建构对方新特性的目的。但仅凭外部力量的强行改造很难实现农村生产力质的突破,强调下乡资本应在嵌入乡村的基础上扎根乡村,其目的就在于打破资本在经营互动时无处不在的“内外有别”的行动逻辑,促使双方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能够对彼此属性进行调和改造。

第一,资本下乡将完成对乡村空间结构和资源结构的改造。结构化理论表明,行动者具备能动性,可以自由修正结构。随着创业者与本地环境互动,本地农村社区的资源状态和结构也将发生变化。^[16]大型农场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田间运粮道路的开辟和硬化等,在改变乡村现有景观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环境;规范化的管理手段、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产—销—加工一体化的生产链条等生产经营模式,将深刻改变村民传统的生产观念,硬件设施的改善和思想观念的改变都将使原本的农村结构发生改变。顺应这种结构的变化,资本在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将不断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

第二,资本下乡将推动双方在组织结构上的改变。上文中所提到的村组织应担负的土地流转协商以及劳动力代雇佣职能都应成立专门的办事小组,这就需要村委会进一步完善组织结构,实现“专事专人专办”。这既是基层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村庄的自治能力。另外,受乡村“熟人社会”性质的影响,资本在经营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管理方式的改变。与城市企业中一贯采取的刚性条例不同,柔性规范在乡村社会中更具适用性,因此,无论是组织管理手段,还是组织结构的层级设置都应更具“人情味”。村组织的“升级”和下乡资本管理理念的“软化”过程正是双方重新建构自身性质的过程。

第三,资本下乡应助力乡村新价值体系的建立。下乡资本无论是与乡村建立起“交情”,还是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采取更符合乡村伦理原则的行事规范,都属于“入乡随俗”的范畴。但资本的到来不应只是单纯的投资行为,其对乡村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也应有一个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即“移风易俗”。例如,作为投资方,下乡资本可以在与村委会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村福利委员会”,将原本“人情”式的福利馈赠发展成乡村中一项专门的福利事业,培育和发扬尊老助残扶幼的优良民风。另外,资本在下乡后应积极参与到村事务的协商与决策中,提供更有效率、更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建议,于潜移默化中影响乡村的处事方式,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建立起新的关系体系。

下乡资本在进入乡土社会内部,与乡土社会中的人、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进行接触与互动的基础上,应使自身所具有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内部力量在乡村社会中发挥效力,如此,才能切实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资本也能够在此过程中得到重构,获得鲜明的农业属性,发展出农业新样态。

五、结论与讨论

无论是从城乡间的结构性矛盾、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的国情出发,还是出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考虑,资本下乡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事实证明工商资本的加入对于农村实现大规模经营,帮助农村年轻劳动力挣脱土地的束缚,加快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工商资本与乡村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下乡之初,二者很难实现功能与结构的耦合。对资本与乡村社会分别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在资本下乡中双方行动逻辑的龃龉,嵌入困境随之而生。

通过系统阐述,笔者认为资本下乡中所遭遇的“冲突”“矛盾”“对立”,正是乡土社会人文伦理中“内外逻辑”的外化,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扎根乡土,认为只有成为乡土社会中的一员,寻找到自己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才能被当地村民认可和接纳并营造一个和谐的生产经营环境。在此基础上双方可由最初的交往互动到更宏观、更深层次的结构互构,农商联合发展,成为利益共同体。

但值得注意和思考的是,当下仍有许多村落留有大量中青年劳动力,土地流转后这些劳动力如何安置?能否保证其收入稳定?值得进一步思考。除了这些“善后”问题要做好,如何真正在农场实现大规模生产经营,构建起完整的农产品产业链,实现从“资本下乡”到“资本促乡”的转变,这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着重考虑并切实推进的又一重要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才能有效打造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 李家祥. 试论乡村振兴中多主体和谐关系的构建——以资本下乡为视角[J]. 理论导刊, 2020(9): 57-62.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EB/OL]. [2020-02-21].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 SCOTT J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 曹宗平, 黄海阳.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因、利弊及治理对策研究[J]. 学术论坛, 2022, 45(1): 124-132.
- [6] 徐宗阳. 内外有别: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 [7] 刘守英, 王一鹤.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28-146+232.
- [8] 熊风水, 童政杰. 农民缺场与在场: 资本下乡的多重博弈与治理——基于S村的经验材料[J]. 天府新论, 2022(5): 123-132.
- [9] 王海娟. 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1(4).
- [10] 徐宗阳.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6, 31(5): 63-87+243.
- [11] 吴琼. 资本与自治的矛盾: 资本下乡的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J]. 领导科学, 2022(10): 142-145.
- [12] 卡尔·波兰尼. 经济: 制度化的过程[M]. 渠敬东,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6.
- [13]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3): 29-36.
- [14] 吕鹏, 傅凡. 资本的有机嵌入——以某农业产业扶贫项目为关键个案[J]. 学术月刊, 2022, 54(7): 138-148.
- [15]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1.
- [16] 许悦, 陈卫平.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基于S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J]. 学术研究, 2022(6): 106-115.

(下转第 98 页)

A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to Economic Growth in Shandong Province

ZHANG Yongmei, JIA Ming, ZHAO Jink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economic growth data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1993 to 2019,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into the economic growth framework with the help of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explain the con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to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long-term static and short-term dynamic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and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is maintained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Among capital investment, an essential driver of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specifically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which accounts for 36.3% per year on average. Such contribution made by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is realized mainly through promoting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refore, while maintaining the stable economic growth in Shandong, efforts should be redoubled in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handong,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nd formulating a sound and proper agenda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Shandong Provin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VAR model

(责任编辑:魏 霄)

(上接第 86 页)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Interactive Explora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and Rural Society from an Embedded Perspective

YANG Xueyun, MU Qicha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more and mor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has participat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as an "outsider" embedded in the rural societ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will be naturally rejected by the social relation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deas i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nd moreover, muc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has more or less ignored the local condition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resulting in a severe dilemma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apital to be embedded in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If the capital can change its identity as an "outsider", internalize itself to take root in the rural society, it needs to have a benign interaction with the countryside. This interaction is a two-way interaction with both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make changes to adapt to each other's development, that is, whil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adapts to the rural conditions, rural lifestyl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of urban features. Both sides work jointly to promote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thus facilita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embeddedness; village-enterprise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魏 霄)